

书写故乡:我的秘密,我的荣幸

本报记者 陈俊宇

河南穰县原本寂寂无名的一个小村庄,因作家梁鸿持续的书写,她的故乡梁庄,成为有名的乡土文化符号。

十年前梁鸿写《中国在梁庄》,获得了2020年“人民文学奖”;接着又写了《出梁庄记》。今年1月,新作《梁庄十年》出版。

十年前,她从一个村庄看见中国;如今重返梁庄,回溯中国村庄的改变与其中真实个体的命运。

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说,倏忽之间,作为村庄最著名的女儿,梁鸿再次重回梁庄,写下了梁庄的迷人。

为什么要写“梁庄十年”?

梁鸿思考过这个问题:如果说此前的《中国在梁庄》和《出梁庄记》里面除了写梁庄人的悲欢离合之外,还有一种大的忧思,数百万中国人共有的“呼愁”,那么,十年之后,我和梁庄的关系又回到了一个人和自己

家庭的关系。

这十年之中,她保持着一年回家两到三次的节奏,每次回家——开始是父亲陪着她,2015年以后是姐姐们和霞子陪着,都会坐在村庄路口的红伟家,和大家一起聊天、说话、打牌,间或看着路边来来往往的人,大家打招呼,或聊几句天。到每家聊天说话,找各种理由,组各种饭局,也在各家吃,“一切都回到了最初的状态”。

“欢喜,深深依恋,同时也忧心忡忡。我就像一个孩子,蹦蹦跳跳的,依赖梁庄,喜欢梁庄的每一个人,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。我的爱多得我自己都兜不住。这是我的秘密,也是我的荣幸。”梁鸿说,我希望把这份爱分享出来,让每一个离家的人,在外奔波的人、想念亲人的人也体会到这份爱——这普通人生中的每一丝表情和笑意,都蕴藏着人性的和生活的奥秘。

“作家写下作为生存之地、生活空间的梁庄,但也写下历史裹挟、时间变迁中的梁庄,这是《梁庄十年》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和震动。

不再只是作为社会问题的梁庄,不再只是作为中国缩影的梁庄,它还是乡民日常生活、情感变化之所。”张莉称,作家以一种更为生动的细节和故事去讲述村庄里的父老、坟墓里的亲人以及她之于这片土地难以割舍的情感,梁鸿写下村庄之变时,其实也写下村庄之不变,从而为我们重新勾勒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乡土风景。

2008年的夏天和冬天,在北京高校里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梁鸿回到故乡梁庄,前后住了约有五个月的时间。

在这段时间,她对梁庄的老人、妇女、儿童,对梁庄的自然环境,对梁庄村庄的文化结构、伦理结构和道德结构进行了考察,试图写出梁庄人的故事,并勾勒、描述出梁庄将近半个世纪的生存和精神图景。

于是,有了获奖无数的非虚构作品《中国在梁庄》。

2011年,梁鸿重回梁庄,收集梁庄在外打工人的联系方式,了解打工者所在的城市、所从事的职业和大致的家庭成员分布状况。然

后,她去全国各地采访从梁庄走出的打工者。她和父亲一起,行走了中国30余个城市,每到一个地方,都和老乡们一起吃、一起住、一起劳作,去体会进城农民的打工生活。

这就有《出梁庄记》,被认为是一份完整的中国当代农民迁徙史”。

梁庄,成了梁鸿的文学根据地。时间发酵,思考更为深邃,反而回到了“看山是山”的状态。她从梁庄的旁观者变成了“在场者”,书中扑面而来的朴素情感、气味就是证明。

中国当代村庄仍在动荡之中,或改造,或衰败,或消失,而更重要的是,随着村庄的改变,数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形态、性格形态及情感形态也在发生变化。

以“梁庄”为样本,做持续的观察,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,“直到我去世”,这样几十年下来,就会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“村庄志”。

这是梁鸿的愿景。

“我想写出这长河般浩浩荡荡的过程,想让每一朵浪花都经过阳光的折射。”梁鸿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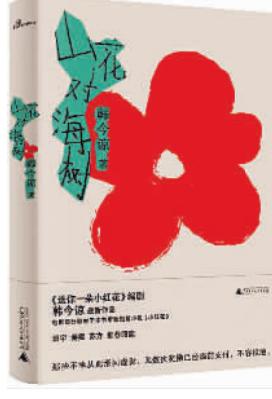
G 新书榜单

现实环境下如何成长



《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》
梁启超著 彭树欣选评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梁启超时代的教育环境同今天极其相似。本书全面收集了他给儿女的书信、家庭讲学文录、自述等,较完整地呈现了梁氏的教育理念和实践,并针对年轻父母和教育者的需要,配以详细的导读,以及每篇书信、文章的背景介绍。



《山花对海树》
韩今谅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真实的伤痛、身后的温暖,皆是生活中的滋味。

本书收录了韩今谅的六则短篇小说,不同的时间和视角,多少毅然曾是枉然,多少愕然终得释然,不同的爱恨羁绊,相似的孤独坚忍。愿读者阅尽其中诸般况味,也更珍重自己的喜怒哀愁。



《金属与肉体》
[加] 奥利维耶·迪安斯著
朱光伟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

本书是关于文化生物学的观察,既探索新技术视角下对世界不同寻常的解读,也探索生命从有机物质向文化表征的转变迁移,讲述了人类和人工智能的关系,以及当下我们对世界看法的转变和文化生物学的出现。



《走出内向》
[美] 杰西卡·潘著
郑志远,桔又译 天地出版社

与陌生人搭讪,公开演讲,来一段即兴表演,用社交软件寻找新朋友,上台表演脱口秀……

本书是一本给内向者、孤独者的社交指南,也为外向者更好地认知内向者提供了一种可能。作者从自己(一个内向者)的视角讲述了在外向世界“跌跌撞撞”的经历。

一种精神的烛照

——读张炜《文学:八个关键词》

李恒昌

《文学:八个关键词》,根据张炜2019年10月在华中科技大学讲学时的讲义整理而成,是他近年来“用心最深之作”。该书围绕童年、动物、荒野、海洋、流浪、地狱、恐惧和困境的八个关键词而展开。

“童年”阐述的是人生和文学的根本问题,启发读者认识童年在人生与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;“动物”阐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,展示出人类必不可少的悲悯情怀;“荒野”阐述的是现代人的精神危机问题,确立了“融入荒野”重要命题;“海洋”阐述的是人生和创作的情怀问题,展望的是更加博大、更具活力的境界和胸怀;“流浪”阐述的是生存状态、创作气质和创作风格问题,展示了精神远游的意义和价值;“地域”是星空下的故事,亦即人与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问题;“恐惧”阐述的则是人生的“天敌”问题:集体无意识既是人性的弱点也是现实的无奈;“困境”则是现实环境与人的矛盾,重在启迪如何突破困境。

八个方面的内容既自成一家,又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,共同构筑起文学与人生厚重的“葵花宝典”,既导航人生与文学之路,又烛照精神和心灵。

“八大关键词”,虽然冠以“文学”之名,但其内涵远远超越文学的界限:以文学为机杼,谈人生、谈精神、谈世界。他传递给读者的不是简单的、具体的写作方式和创作技法,而是人生立场、生活方式、思维方式。如在关于“童年”的论述中,他指出,“一个人精神的成长,其实是从儿童时代开始的。”某种食物将一个成年人“拖回”童年,“这当然不仅仅是为了一份口腹之欲,更是精神、意识心理层面的综合拖拽力。”在谈到作家文字背后的秘密时,他指出:“这些秘密与其说是物质的,不如说是精神的。”在谈到文学的根本问题时,他论证了人生和文学中的“外祖母现象”。论及人与动物关系时,他认为,“一个人与动物结成的心灵关系,即精神的联系到底如何,基本上决定了他是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。”谈到恐惧,他从弗洛伊德的理论和“集体无意识”理论,作出精神层面的分析。这体现了张炜作为写作者,对精神纯粹性的重视。从这个角度讲,这部书既是文学的,也是思想的,是精神的星辉。

该书切近的思想内涵自有其渊源。作为茅盾文学奖得主,张炜通过艰苦的努力,创作出近两千万充满诗性的文字,它们相互独立又相互辉映。

成功的奥秘在哪里?在这部书里,他都既无所保留,又十分谦卑地作出了回答。

我们有必要追问:我们拥有过怎样的童年?我们是否下过不屈和反抗的种子?我们的某些思想和行为,是否属于导致如海潮般诅咒的诱因?我们为什么会与离永恒最近的莽野越来越远?我们的创作为什么会越来越浮躁,越来越类型化?我们是否真正免除了对自身和对同类的恐惧……

有所反思,有所追问,才是阅读这部著作最大的收获。

重读《傅雷家书》的启示

朱辉

傅雷长子钢琴家傅聪因感染新冠病毒不久前去世,《傅雷家书》又一次引起关注。

20世纪八十年代初《傅雷家书》刚出版,父亲就买回来给我们读。这本书后来被称为中国人的“教子圣经”,当年我才十多岁,按说并不适合读。后来明白了,父亲在某些方面有点像傅雷,是个严父。他认为我们读了《傅雷家书》,就能领悟到为父不易,理解“打是亲骂是爱”。

国人喜欢立言,家书是立言最好的载体。这些年来,读过不少名人家书,明白了《傅雷家书》历经三十余年,畅销不衰的原因。

因以某种角度划分,名人家书可分为两类:一类是“傅雷家书”这样的,另一类姑且称为“方遁翁家书”。傅雷那些家书是他去世十几年后,上海音乐学院工作人员打扫一个杂物间时发现的。而许多名人写家书,就和《围城》里的方遁翁一样,预先就考虑到要出版,下笔难免拿腔拿调。而且出版前还会润色,阅读价值大损。

因为《傅雷家书》,不少人认为傅雷是家里的暴君,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。如今稍微搜索一下,就能知道傅雷对傅聪,不仅经常呵斥,家暴也非常严重。许多年后,傅聪曾说他当然知道父亲打他狠,正因为爱他深,但“爸爸打得我真痛啊!”

因为《傅雷家书》,不少人认为傅雷是家里的暴君,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。如今稍微搜索一下,就能知道傅雷对傅聪,不仅经常呵斥,家暴也非常严重。许多年后,傅聪曾说他当然知道父亲打他狠,正因为爱他深,但“爸爸打得我真痛啊!”

可怜的孩子,怎么你的童年会跟我的那么相似呢?我也知道你从小受的挫折对于你今日的成就并非没有帮助;但我做爸爸的总是犯了很多很重大的错误……可怜过了四十五岁,父亲才真正觉醒!”读《傅雷家书》,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傅雷许多次的忏悔。这些忏悔或许难以弥补对于傅聪童年的伤害,然而放在几十年前,对于一个中年父亲已经难能可贵。即便到了今天,许许多多已经年逾古稀的严父,依然对自己曾经的“暴行”无怨无悔。他们不明白,相比于世俗意义的“成功”,孩子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十分重要。

在杨绛的回忆中,“傅雷的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,他自己可以笑,他的笑脸只许朋友看。在他的孩子面前,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。”

“孩子,我虐待了你,我永远对不起你,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……人生做错了一件事,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!有些罪过只能补赎,不能洗刷!”

“可怜的孩子,怎么你的童年会跟我的那么相似呢?我也知道你从小受的挫折对于你今日的成就并非没有帮助;但我做爸爸的总是犯了很多很重大的错误……可怜过了四十五岁,父亲才真正觉醒!”读《傅雷家书》,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傅雷许多次的忏悔。这些忏悔或许难以弥补对于傅聪童年的伤害,然而放在几十年前,对于一个中年父亲已经难能可贵。即便到了今天,许许多多已经年逾古稀的严父,依然对自己曾经的“暴行”无怨无悔。他们不明白,相比于世俗意义的“成功”,孩子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十分重要。

可怜的孩子,怎么你的童年会跟我的那么相似呢?我也知道你从小受的挫折对于你今日的成就并非没有帮助;但我做爸爸的总是犯了很多很重大的错误……可怜过了四十五岁,父亲才真正觉醒!”读《傅雷家书》,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傅雷许多次的忏悔。这些忏悔或许难以弥补对于傅聪童年的伤害,然而放在几十年前,对于一个中年父亲已经难能可贵。即便到了今天,许许多多已经年逾古稀的严父,依然对自己曾经的“暴行”无怨无悔。他们不明白,相比于世俗意义的“成功”,孩子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十分重要。

G 高谈阔论

书籍译者是否得有资质?

冷荞麦

近日,一个朋友让我看她的一篇新作,并让提点建议。读完友人作品,建议在描述人物情性和典型特征时增加一些细节描写,借助场景或人物行为、表情等的翔实笔墨,以传神的“画面”描绘,让叙事、人物更鲜活地生动起来。探讨一番之后,我多说了一句:“就像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中普鲁斯特‘又臭又长的裹脚布’那种。”

听到这句话,朋友突然转向,冒出一句:“外文书籍的翻译应该有个资质考核。”她说,现在很多中文译本都没法看,也不知道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家伙翻译的。

我对“考本”之说一向嗤之以鼻:什么样的人或机构有资格和权力来评判合格与否呢?不过说到汉译书籍的问题,鄙人倒是深有同感。以理论书籍阅读更多的自身体验来说,“没法看”只是小问题——虽然佶屈聱牙但总算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,真正的问题是坚强而辛苦地完成阅读后,却发现自已仍停留在不懂的地界。

曾经以为之所以困,是文化素质低下之故,后来感觉问题好像不在此,很可能是自己所读的东西,本身就艰深晦涩。但想到萨特哲学家那么能蛊惑青年人,心里还是有些疑惑。后来有一次偶遇留学美国收揽哲学博士的大侠,顺道就问了一下:怀特海的书是不是特别难懂?结果博士说不是,“是翻译的问

题。你要看英文原著会容易得多。”想到英文对俺来说更难,就没敢再继续探讨。

再后来,我开始留心“翻译”的事儿,偶或会把不同版本拿来比较一下,原来还真是如此:很大程度上不是外文表达晦暗,而是译者文化素养太差之过。比如夏目漱石的《旅宿》(草枕),第一次看的时候就读不下去,后来拿到了丰子恺译本,不仅顺畅舒心地翻阅到了最后一页,而且还有点儿“心领神会”的愉悦。这是文学书籍,反观哲学书籍,本来就充斥着各种不容易理解的抽象概念,要是再被似懂非懂的人翻译出来,那岂止是晦涩难懂,定然必是天书般的“不懂之书”。

举个简单的例子。play off,鄙人英文极差,但知道在美国职业篮球联赛中其意所指是季后赛,或者翻译成决赛阶段的比赛也可以。然而,在某些涉及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内容的文本中,我不止一次地读到,翻译家将之译作比赛完以后的赛事,更有高手译成“加时赛”。

这是普通的文化素养问题。生涩词汇随时闪现的专业著作,译者要没有专业的中、外文素养,读者云里雾里稀里糊涂差不多才应该是正常状态。

撇开专业书籍,以大众读物文学著作来说,同样也是问题多多,尤其是里面蕴含的文化背景、文学意象,以及相应的隐喻、象征之类,显然不是通过简单直译就可以表达出来的——就如胸有成竹不是“肚子里有根大竹子”所能表达出来的一样,这也是为什么译者

名家屡屡不辞辛苦“画蛇添足”注释小字的原因之一。想到现在的多数名著译本,能做到语言顺畅就不错了,要享受到傅雷那般的“美佳佳看”,还真就成了相当困难的事儿。

一本书翻译的优劣,可以说,不仅和译者的文字功夫、知识储备有关,而且还同译者的思想辨识以及原著建构的文化背景紧密相连。所以,要想不归类到“没法看”的园子里,译者、校审者,不仅得外语水平过得硬,还须得熟识对应语言背后的文化,更得拥有匹配的汉语水准。无论是专业读物还是文学作品的翻译,都是如此——并非汉语水平高下那么简单。

可见,“资格考试”的说法并非无厘头的说词。

从另一方面来看,我们当然希望出版商自律把关,可是面对充斥市场且急于兑现利润的短视出版商,这点希望有点难于达成。比如说那些经典名著的胡乱翻译,有金字招牌开路,短期效益还是可期的。尤其是老外的“新书”,在天花乱坠的广告词冲击下,爱书人很容易上当。

诚然,长远看,不管是译者名号,还是出版商招牌,都会大浪淘沙留下真金,但就目前的情形而论,依个人之见,市面上汗牛充栋的外国文学经典译著大部分都不值得阅读,其他类译著就更不用多说了。

鉴于此,对翻译者临时来个“资格许可”,或者标注个等级头衔,应该还是有益的吧。您认为呢?

牡丹

恽寿平 [清] 绘

供图

曾经以为之所以困,是文化素质低下之故,后来感觉问题好像不在此,很可能是自己所读的东西,本身就艰深晦涩。但想到萨特哲学家那么能蛊惑青年人,心里还是有些疑惑。后来有一次偶遇留学美国收揽哲学博士的大侠,顺道就问了一下:怀特海的书是不是特别难懂?结果博士说不是,“是翻译的问

题。你要看英文原著会容易得多。”想到英文对俺来说更难,就没敢再继续探讨。

再后来,我开始留心“翻译”的事儿,偶或会把不同版本拿来比较一下,原来还真是如此:

很大程度上不是外文表达晦暗,而是译者文化素养太差之过。比如夏目漱石的《旅宿》(草枕),第一次看的时候就读不下去,后来拿到了丰子恺译本,不仅顺畅舒心地翻阅到了最后一页,而且还有点儿“心领神会”的愉悦。这是文学书籍,反观哲学书籍,本来就充斥着各种不容易理解的抽象概念,要是再被似懂非懂的人翻译出来,那岂止是晦涩难懂,定然必是天书般的“不懂之书”。

举个简单的例子。play off,鄙人英文极差,但知道在美国职业篮球联赛中其意所指是季后赛,或者翻译成决赛阶段的比赛也可以。

然而,在某些涉及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内容的文本中,我不止一次地读到,翻译家将之译作比赛完以后的赛事,更有高手译成“加时赛”。

这是普通的文化素养问题。生